

腾出稍微利落的地盘，让她舒服一点。我看她那样专心，没注意到我，却没料到，当我将两只垃圾袋扔到门边时，文阿姨突然发话：“你可别给我扔啊，我都有用。”

天啊，刚刚还向人夸她比我妈随和多了，这下完了！

文阿姨是我国健在的翻译家前辈，日英文兼通。那天在她众多的纸物里，看到的我认识但并不懂的日文字码，一点不觉得奇怪。

也是这天我接受了文阿姨一个任务，她看我给她画像，夸我画得比她儿子萧桐好（其实一点不好，太匆忙了），便表示希望我画一张年轻的萧乾，所参考的放大黑白老照片就摆在床边的旧桌上：二十九岁，摄于



1997年赵衡陪爸爸赵瑞蕪、妈妈杨苡拜访萧乾伯伯留影

欧战时节，这位大陆唯一的二战大记者帅极了！

只可惜尘埃满框了。

2019年3月17日

陈秉良：刚毅坚卓写春秋

○李敏



陈秉良老学长出席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活动

陈秉良，江苏宜兴人，1926年出生。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1949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水利水电专家。先后参与三峡水电站、云南鲁布革水

电站等国家重点大型水利水电项目的论证和建设，为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代青年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在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活动的一次师生对话上，面对云南师范大学青年学子的提问，陈秉良毫不犹豫地說出“刚毅坚卓”四字，全场掌声雷动。

辗转至昆明

192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陈秉良是家中长子，其父母重教育，竭尽全力让

□ 人物剪影

孩子们去上学。陈秉良和弟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成为那个年代罕有的大学生，两个妹妹也接受了教育。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战火逼近，陈秉良一家只得随老乡们一路逃难，颠沛流离，后来辗转到贵州铜仁，才换来片刻安宁。虽然处于战乱中，但陈秉良的父亲却深知知识的重要性，竭尽全力帮陈秉良再续校园梦。到铜仁不久，陈秉良便入读铜仁国立三中，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提及母校，陈秉良颇感自豪：“铜仁国立三中的前身是国立贵州临时中学，也就是现在的铜仁一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及沿海滨江学校纷纷内撤。教育部为了收容安顿撤退出来的中学师生，决定成立国立河南、四川、贵州、陕西4所临时中学，不久取消“临时”二字。后因全国国立中学陆续增加，便改以序数为校名，选址铜仁的贵州国立临时中学改名为国立第三中学，简称“国立三中”。国立三中在铜仁八年，毕业九届，考取大学的学生比例为国立中学之冠。不仅如此，国立三中成立不久，流亡的江浙师生包括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余正清、马松子、王竹铭和进步教师刘苇、刘云、冯大鹏等来到该校，秘密组织“读书会”，开展“曙光剧社”等进步活动，创办《文坛》《文笔》等进步壁报。陈秉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自己的高中学业。

联大时光

1941年7月，受国民政府委托，前往美国购买飞机和招募飞行员的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

陈纳德回到中国，带回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为了有效配合援华美军作战，培训翻译人员，1941年秋成立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通称“战地服务团译训班”）征调或招考了4000名左右的英语译员。译员主要来自大学及专科学校学生、在职编译人员和英文较好的知识分子。

1943年，高中毕业后的陈秉良来到昆明。期间，一心想要继续学业的陈秉良想报考西南联大，但因生活所迫，愿望只得暂时搁浅，后加入了译员训练班。“训练班也叫The interpreter school，训练合格后为美军当翻译。”为了生计，陈秉良加入了训练班，闻一多成了他的老师。

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陈秉良也结束了翻译工作。期间，他上大学的信念从没有断过，但不能因备考断了生活来源，于是，陈秉良去云南宜良的滇越铁路子弟小学当了一名老师，一边教学一边复习。为圆大学梦他全力以赴，1945年终于成功考取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据西南联大校友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共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商、工及师范学院，其中工学院主要是清华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则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都有。”

“大一时不分系，同学们在一起上大课。当时有很多大师，比如我们的语文是沈从文教的。”说起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陈秉良在《西南联大口述史》里满是自豪地说道。“还有潘光旦、陈寅恪、朱自清。”西南联大校友彭鄂英补充道。

1946年5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

清华、南开开始陆续复员北返，陈秉良也在其中，后来他入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于1949年毕业。

“对于西南联大，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她的民主作风。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区里，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对于自己短暂的联大时光，陈秉良这样说。

投身水利事业

“1949年前，工作是自己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作由组织分配。1949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北丰满水电站。那时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而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基础较好，但需要一批人才。”陈秉良说。

丰满水电站位于松花江上，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水库总库容108亿立方米，是我国建成最早的大型水电工程。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进驻丰满水电站，后在撤离时带走了大量设备，只留下2台破旧的水轮发电机。1948年，东北人民政府对电站进行全面修复和改建。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修复和改建的难度可想而知。“最大的困难就是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很多方面都要从零开始。但无论是做工程还是其他事，首先要明确目标，目标明确后，要不畏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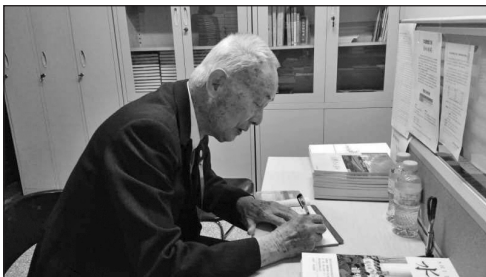
难，一个劲儿地往前钻。”陈秉良说。

因天气寒冷，加上长期劳累，陈秉良患了肺病，久治不愈。1952年前后，他不得不返回家乡江苏宜兴养病。病愈后，正值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正在寻找合适的助教，在前同事的推荐下，陈秉良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助教工作。两年后，他相继进入水利部基建总局和规划设计院工作，期间，还参与了三峡水电站的论证工作。

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决定在建筑业开展招标投标、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工程质量监督办法等一系列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搁浅多年的云南鲁布革水电站项目得以顺利推进，陈秉良参与了鲁布革水电站引水工程的国际招标工作。“鲁布革水电站作为我国第一个采取国际化招投标的水电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陈秉良介绍，鲁布革水电站在我国首创了采用国际通用的现代项目管理模式组织大型水电项目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一系列项目管理经验，对我国推行国际工程招标和项目管理起到了巨大作用。

1988年，62岁的陈秉良退休。退休后的他并没有让自己“十全美景享余生”，而是立刻投入到大亚湾核电站项目的建设。之后，陈秉良又相继参与四川二滩水电站项目建设、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项目建设、孟加拉国第一大港——吉大港项目建设。就这样，陈秉良一直工作到80多岁才真正闲下来，正所谓“雄心犹在，不用谁问廉颇老！壮志再酬，何须人道岁月少。”

（转自云岭先锋网）



2016年校庆陈秉良学长来校友总会捐款